

轉載自《多維周刊》總 168 期

學生抗爭是歷史的重演

- - 致 ZXL 主席書 (1)

中國大陸學者高王凌教授推薦來已故旅美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 (1918-2000) 於 1989 年 5 月 19 日寫給友人的長信。其時正值中國大陸學運高潮導致政治危機之際。多維全文發表黃仁宇先生這封長信。

黃仁宇

ZXL 主席：

我一來敬慕你的爽直，前年我來哈爾濱你逢人就說：‘若是四十年前我與黃兄狹道相逢時，那時候我們只能以槍桿子見面的！’因為當日在東北戰場我們分屬敵軍。倒是只因無緣一面才能四十年後在第二屆國際明史會議的會場上聯歡，也能與去年于在紐約匆匆聚餐。別來還沒有通音問好，這封信倒是要和你談論一段國家大事。我寫這信時深深的覺得‘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已是確切的情景。倒因為我們背景不同，情誼不深，距離既遠，沒有人身上的牽掛顧慮，越能盡所欲言。所以這封公開信，也就寫給你。我想你體味到內中之建議的性質時，必能原宥我的唐突。

我猜想你現在仍在黑龍江。信上的事也不妨先從黑龍江說起。1969 年三月你們的部隊和蘇聯的部隊在烏蘇里江島上衝突。蘇方自稱死數十人，並且不久戰事即延到新疆邊境，克里姆林宮的人物即有向中國使用原核武器的企圖。九月十六日由國家安全委員會 K.G.B. 的情報人員路易士 Victor Louis 用新聞記者的名義在《倫敦晚報》發表文章，聲稱蘇聯有向新疆使用原爆之可能，主旨在探詢其他國家之反應。翌年蘇方又在維也納歌劇院遞交美國外交人員一張未具簽字的草約一張，內中稱締約國如遇第三者準備有原爆的挑釁，可以採取報復行動，並且通知締約之對方以便取得諒解，共同協商。尼克森和國務卿吉辛格則認為這樣一紙條約等於要美國事前承認蘇聯有權對中國使用原核武器的權力。吉辛格更認為十億中國人陷於無政府狀態絕非世界之福。而且新疆邊境去蘇聯鐵道的終點近在咫尺，去中國鐵道的終點則好幾百里。如果中國要向蘇聯尋釁，也不會找上這樣一個于本身不利的地方。所以當時美國與人民共和國還沒有外交關係，而且技術上還站在敵對狀態，自此設法通過第三者和中國接觸。

以上情事已寫入吉辛格的回憶錄《白宮的歲月》裡面去。如果這還是他一面之詞，則前蘇聯籍聯合國副秘書長史勿成科 Arkady N.shevchenko 投美，他所著書稱《與莫斯科決絕》，也提到此事幕後情形。烏蘇里江事出於蘇聯高級人員意外，他們也真怕中國會派百萬大軍入侵，所以討論使用核武器確有其事。國防部長還主張動用最大氫彈，如果成為事實不僅幾百萬中國人命立成齏粉，而且塵埃回降還會使蘇聯境內受害。只有參謀總長始終認為不可。根據史勿成科的報導最後使主戰派懸崖勒馬的還是美方警告的力量為多。

這些發展與蘇聯和越南于 1978 年訂立攻守同盟條約有關。蘇聯的企圖是沿著中國的邊境，通過外蒙印度等國造成一種包圍形勢，所以你們的領導人一定要打破如是的包圍，才出兵于老街和諒山之間。當時也需要相當的威信與膽識才能主持此事。經過如此一段意志力之決賽後白茲涅夫（通常譯作勃列日涅夫）才轉換口氣于他去世之前幾個月一再呼喚要與中國改善關係。甚至他還以充滿著情緒的言辭講出：“我們還記得昔人為盟友以同志的地位相互合作的日子。”（言辭載 1982 年三月二十五日及九月二十七日《紐約時報》，白茲涅夫死于當年十一月十日。）

你們的領導人才干膽識很高。在一種平時狀態去發動一段局部化的國際戰爭是非常困難的。當其他人都能優游于後方的時候誰又願意在此刻葬身于老街及諒山之間？所以他的威信是從這行動及其他行動造成的。因為如此，他不喜歡聽人建議重開 1979 年向越南進兵期間民主牆各事。此人脾氣執拗。他之拒絕討論此事，也成了一段意志力之決賽。在他看來你們一再要提及此事，即是要動搖他的威權之基礎。

我作這樣的論調，一定也要受到千千萬萬人咒咀的。難道這二十世紀的末期，還不是一個民主和自由的世界？你憑什麼還在提倡威權必出自武力？我並沒有在提倡，只是報告一段最基本的事實。民主和自由都是抽象的名詞，具體化時務必透過實際的方案。你們領導人的威權也不是沒有民主與自由上產生過積極的效果，例如整肅四人幫的力量，發動現階段的經濟改革起先都靠這威權作主。我們在哈爾濱開會的場所叫做“退伍軍人就業訓練所”。恐怕很少人會想起使一百萬軍人有秩序的退伍除了在台灣有先例外在中國大陸為歷史上之前所未有。也只有有了這段準備，以後的改革才可展開。也只有軍委會的主席才可以主持此事。至於年輕人之提倡民主與自由，為什麼又要遊行示“威”？可見得法制未備個人的權利與義務尚無確定的交代，一切仍待爭取。可是知識分子如是，至今還有上萬的農民每天蜂擁到大城市里尋活計，無地可容以致在車站和公園住夜。對他們的自由，又作何處理？

老實說來我的脾氣也很壞。又不願仿倣官僚主義下的“公車上書”，“為民請命”的

去碰釘子，自招奚落。年輕的時候我們的軍隊被你們在遼沈戰役和淮海戰役消滅得一干二淨，也只好遁跡海外，糊口四方。今既不能與年輕人共患難，也無道義上的力量寫“告中國有志青年書”。所以信中縱是牽涉億萬生靈存亡之事，仍以與老兄閑談的姿態出之。說得不好，你也可以說此人乃昔日之敵人，今朝泛泛之交，他自稱海外鴻爪，也不足見怪。

?歷史在重演?

老兄知道我在國民黨軍隊裡只是當下級軍官。抗戰期間在雲南當排長的時候穿草鞋還要自己出錢買，一個時期士兵無換洗衣服，除了經常吃極粗糙的玉蜀黍外，尚難吃到白米飯，以碎瓦片竹片當廁所裡用的手紙，患瘧疾即無奎寧丸，眼看到不幸的士兵小病三數日後即被拖死。他們被拖來當兵，主要的還是無力無錢避役，一有逃亡捕獲即只有草率訊問槍決。我們一回到後方看到國立大學的學生既不服役又一切公費還在組織“反飢餓”運動，我們的反響可想而知。

看樣子我把今日在天安門絕食的學生和有工人群眾參加的學運與國民黨時代的學生運動比較，好像語無倫次。同時我自己也從沒有像他們一樣，坐視目前的生活，將來的出路，一生的希望與前途都被一個政府支配著和左右著的經驗，這問題容我在下面作適當的建議。刻下要提及的則是從旁人的眼光看來，他們仍是中國之優秀份子，特殊階級。最近我才看到你們國務院一個單位的通訊，說及1978年仍有二億人口不得溫飽。一個貧困地區的省委在報告上寫出：

“過去我們不僅剝奪了農民的財產，也剝奪了農民的自由，這是造成農民窮困狀況幾十年甚少改變的兩個重要根源。”我在北京與東北逗留的二十天內，也不止一次聽到人說很多幹部看到革命幾十年后人民生活之困苦如舊，至於哭泣，也提出“起來打扁擔”之可能。這種危險就不論我們是左是右，是前進或頑固，總是不能忽視了。

迄今我還沒有聽到罷課的學生提出他們的生活待遇問題。但是任何人作客觀的分析，也不能否定目前貨幣貶值，都市人民生活受影響，也是這群眾運動後面的一種潛伏著的推動之力量。加以公教人員待遇特低，“開頭顱的不如剃腦袋的”，“彈鋼琴的不如搬鋼琴的”（蘇曉康和張鋼《河殤》第四集解說辭）。這種情形只值得我們同情也應當廣為傳佈。至於很多學生對美國新聞記者說及官僚階級貪污腐化閉塞言路，則更引起我得一段記憶。

你一定還記得起國民黨在大陸的聲名，也以貪污腐化著稱。我在美國教書的時候，同事就勸我不要在學生面前提及自己曾在國軍服務的情形，因為這事對我個人之信譽只有損無益（事實上我對所有的學生都講過，曾未包瞞）。說到貪污腐化也

確有其事，而且情節聽來駭然。太平洋戰事之前夕我們在哀牢山上與佔領越南之日軍對峙。在兩方營私做生意的，無不靠軍人支持，進口為肥皂香煙鴉片，出口為戰略物資，主要的為桐油礦砂，我自己當中尉參謀時曾用“黃禾”的筆名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過一篇文章。當日少年氣盛，我自以為將此黑幕如是暴露即是自己對國事的一點貢獻。

為什麼幾十年後年輕人還要步我們之後塵？難道歷史只能作惡性之循環，而中國永無突破環境之日？我在國軍的一段職級低微能力薄弱。可是同時忠智之士不顧本身利害以濟公家之急的又何止以萬數？以十萬計？又如你所說的，你們靠兩條腿子和我們坐飛機競賽進入東北，首先第一步的工作即是組織民眾。何以幾十年後又是舊調重彈依然如故？

我花了近四十年的時間讀歷史，覺得情形絕不如是的簡單。很多人對現狀的觀測，得自身旁各種事務。可是五四運動至今已七十年，中國不可能沒有劇烈的更變。不過此間更變的幅度大，身在其境的人很難一眼看出。我以局外的眼光縷列于次：

國民黨和蔣介石替中國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

共產黨與毛澤東翻轉了中國的低層機構，

你們刻下的任務是重訂上下之間的聯繫。這種運動業已展開。刻下的困難，也即是局面已經展開的必然後果，否則就不會產生這種問題。

我知道這種說法，刻下必要冒犯很多的年輕人。可我寫這封信的目的不是向任何人討好，而是由於命運的安排，我偏看到一些別人沒有看到的事物，因此寧可挨罵，不敢不說。

（未完待續）

中國今日最嚴重問題不是專制獨裁

- - 致 ZXL 主席書（2）

黃仁宇

（續前）？讓我危言聳聽吧

你們刻下一切問題之癥結出自經濟。而最大的毛病，始自價格的雙軌制。此中沒

有了不得的奧妙。中國現在擁有兩重經濟：一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一是民主社會的自由經濟。前者由國家作主，198年前為全國不法二門，一切統收統支，至今仍舊不能放棄。如果放棄這一部門，像方勵之教授的天體物理學就不能開課，因為一般人的生活程度還是這般低，還講什麼太陽系統星座結構？也不應當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因為衣食住行百事待舉，還憑什麼去搶游泳跳水錦標？在類似情形之下中國很多重工業化學工業航空工業也都是瞻望前途，不顧刻下市場需要先期組織成的。所以在分配資料時即也帶著津貼性質，非如此國家政府軍隊與高等教育無法展開，中國也永遠不能透入到新世紀裡去。

要是僅是維持這樣一個系統，即無目前之紊亂。可是像蘇聯的經驗，鋼鐵爐繼續生產鋼鐵，能源又用以尋覓能源，機床又製造機床，最後只能出產大批戰車火箭，而逐漸置人民日常生活于腦後。這樣的一種體制，只有對內專制獨斷，對外帶侵略性格。十年以來的改革即是要打破這環境，也有了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所以承包到戶、個體戶、鄉鎮工業，“把經濟搞活”，都是與計劃經濟對立的，也都是相次的承認私人財產權，以市場經濟的機構作用亦即供應對要求的方式作主，由下而上的構成一種新體制。

可是這樣一來到處都發生雙重價格，一噸鋼可以賣到七百元，也可以賣到二百元，甚至國營工廠的鋼材合格的收價低，不合格的拋賣于自由市場，倒可以獲價四倍以上。凡是分配資源的人，稍一盡忠職守則必濫用權力（華生、張學軍、羅小朋于《經濟研究》1988，12）。況且兩種體制競爭時一切都在法律之外。今日大城市里的餐館中常有外地來的幹部來談生意，舉止闊綽，也不知道他們系代表公家或私人，是否合法，甚至是否貪污或廉潔。刻下士氣人心之不振，大抵由於當中是非不明。你們的領導人又不出面解釋此間關係。因為整個經濟改革尚是在試驗之中造成。當初在四川偶然創試就是違法，違法經過默許，默許之後全部公開才一體施行。我可以猜想即是在你們黨中央要強制執行通過某種新政策也一定會遇到相當阻障。

這也沒有什麼了不得。本來革命就是一種非法行動。當初只求合理，然後在本身造成傳統，自此才有成例可援，然後才談得上合法。

目下經濟改革受阻礙，據報載由於將能源與交通用盡。我們也可以想象像旅遊的事業需要投資輕，利潤指日可得，投入的必踴躍。開大發電廠需要資本大，前途渺茫，吸引力小，只是沒有後者也沒有前者。現代經濟的組成由於分工合作，高度的互相依賴，進時成螺旋狀的前進，退時產生恐慌，無秩序的直瀉倒閉。現在姑讓我危言聳聽吧！我希望以下的事情不發生。可是現在既稱不得前進也無法後退，又已產生了動亂的空氣，使國外的投資望而卻步甚至可以影響到旅遊事業。年輕人雖然提出民主與自由等抽象的要求，卻沒有具體改革之方案。萬一 1960

年間的天災重現，恐慌倒瀉不言可喻。中國的鄉鎮工業是由於高比例“負債經營”組成的（《發展研究通訊》1987，5）。這也就是說靠銀行貸款和各種債務舉辦擴充的。因為其進展經過極度的高速，其擔當風險的程度也高。一度處於逆境，失業與破產堪虞。雖說中國到底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不像十足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完全以“利潤掛帥”，可是你們的破產法、失業救濟和合于時代的貨幣政策尚在嬰孩期間。外匯的存底又薄弱，就不能以為政策合符邏輯，良心無愧，則可以高枕無憂忽視技術上可能產生之危機了。

?袁世凱的問題並不存在

所以從各方面看來你們刻下最重要的工作是利用技術上的必然趨勢彌補因道德觀念所產生意見之分歧。我不相信中國今日最嚴重的問題乃是主政者專制獨裁跋扈，而是各人有各人的意見，而動輒把一個技術問題解釋而為道德問題。換言之袁世凱的問題不存在，倒像北宋期間王安石與司馬光等的爭執。

XL 主席：在這情形之下，寫給老兄也有一種好處，一方面你也是人民解放軍的老幹部，另一方面也不拘行跡，可以隨便由我拖著到紐約第六大街的小餐館閉談。現在我第一步要請老兄認識的：人民共和國近四十年的措施並不出於馬克思的體制。

在哈爾濱會議的閉幕式裡我曾說起我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有《讀書》雜誌提出（1983年5，10），我完全承認。但是我對於馬克思的著作也並不是毫無所知。他在歷史學上最大的價值，在於他是一個“理性主義者”rationalist。大凡一件事發生，必有其前因後果，不能因我們憎恨討厭，即給它一頓痛罵，即將之擯棄于歷史之外。在他看來“時間之彙集”timing 非常重要。資本家可能革命，可能前進，農民和小店舖的老闆可能反動，視情形而定，也即如孟子所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可是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出於他尊重私人財產的絕對性。馬克思主義作家與古典派經濟學家同認為勞工的勞動力，是他最重要的人身財產。這種觀念在蘇聯近七十年的歷史和人民共和國至少前三十年的過程中全未付諸實施。倘非如此即不會有近十年的改革，而且哥爾巴喬夫也在倡導他的改組 perestroika，也無法言之成理。

根據前述國務院的報告，在現行改革前三十年人民共和國的財政稅收統可以“價格剪刀差”概括之。這也就是說政府向農民低價收購糧食，也向城市工人和公務員低價推銷，於是同時將鄉村及城市的工資壓抑到極低的狀態下，才能存聚資本。所以現在很多城市里的新建築物 and 鄉鎮工業向國家銀行所借的資本，都不外這三十年“少吃多做”刻苦積蓄而來。可是在掙節的過程中都沒有把各人權力放在眼裡。這份報告指出在三十年內農民沒有行動的自由，“隱蔽著的總貢賦為六千

億元以上。”

類似的情形也在蘇聯存在著好幾十年。最近一位與哥爾巴喬夫極為接近的經濟學家亞干白詹 Abel Aganbegyan 著書稱參加集體農場所獲工資不敷勞動力成本(即所得不能糊口)，這也是忽視最基本的人身財產的例證。根據他本身經驗，遲至1953年一座距莫斯科不到百哩的村莊無電氣，無道路，無交通工具，只有鄰村才有一家商店，每週開門二次，所售者唯有糖與鹽。即是最近經行西伯利亞鐵道的旅行者仍稱沿途無物可購。如果中國人民埋怨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則蘇聯境內很多最基本的物資尚付諸闕如。人民祇得存款于銀行，其頭寸則被政府挪借填補國家預算之赤字。

以上兩種體制成為可能，因為同屬戰時體制。在群眾心理和社會組織上講東西冷戰對蘇聯也實在是一種戰爭。中國即一直在準備著“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公算。直到1985年六月中共中央軍委會擴大會議才把這政策扭轉過來（根據北京週刊所編《中共十三大與中國改革》）。

當初我們不同意你們如此的做法，可是以後在海外平心靜氣的把所有的資料全般展開，我仍不能說今日如再有同樣的機緣我必會參加你們的陣容。可是我已經在你們的行動之中，看出“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歷史之運轉，通常利用群眾運動中最龐大的力量，完成他們命運最緊要之安排。只是各人眼光有限，雖當事人不能切實明瞭他們所製造的事情之真意義。必待到經過一段時間，有了歷史之縱深，使我們承前接後的看來才能在因果關係中判斷這些事情之意義。四年之前我聽說上海的北豐花園至真茹之間已連成一片，當中有新設計的十二個小市鎮可以有計劃的讓七十五萬人遷入。設計時不僅要顧及水電衛生，而且也包括醫院學校(《紐約華語快報》) 僅是從這條新聞並參照我所知道的背景上的消息，我也敢於斷定，如此的存積資本不可能因平時狀態由合法的秩序主持之（合法必依照公認的前例），而只能以戰時狀態全面征集人力物資以高速的方式完成。從此中我也可以看出：

1，上述行動有它歷史上之長期合理性，因為非如此中國不能生存。這結論不能僅從中共的歷史裡看出，如果要有系統的追根溯源，必寫成專書。即是簡短的介紹，最短亦須搬出百余年的史蹟，長則千年。以下當再談及。

2，這樣的存積資本不可能再繼續，也無法重來。前所謂戰時社會組織與戰時群眾心理至“文化大革命”已推進至極端（也是在那種情形之下林彪在倡導“克己復禮”和讀《毛澤東語錄》），現在早已被否定。

3，過去的行動必曾包含著無數對各人不公平之事跡。例如昔日將地主打死，今

日有承包到戶的生產，還可以將主權轉讓（這方案蘇聯也在仿倣）。遷入真茹新住宅裡的戶口，未必即是過去付出“隱蔽著貢賦”的戶口。我們只能以最沉痛的心情，對無辜受害者以及抗戰內戰以來的陣亡將士各烈士及文革中受害者同樣的紀念著，沒有他們的犧牲，中國即無法完成其革命。同時也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國綽號“老虎總理”克裡孟梭 Clemenceau 所說：“革命總是一個大整塊”。亦即如上述戰時社會組織和戰時群眾心理一樣，其意識形態即是一個大整塊，其行動必帶集體性，更無違計及各個人間之公平。

所以我極端的主張大家都不念舊惡，都承認中國的舊社會業經在土地改革的過程中解散（詳下），新體制從頭設計旨在替下一代著想。好在有了文化大革命，每個人都曾付出若干代價。現在換得的或企圖換得的乃是中國人的“生存權力” birth right，包括人身安全及失業救濟社會福利等項，有如孟子所說“樂歲終身飽凶年免于死亡”（這也是限制人口的邏輯）的生存權利。從這最基本的出發點今後各人才能自識指歸。如此一來即憤懣不平的幹部也可以心安理得了。

4，現在搬進真茹新住宅區的工人及公務員，也不當視作特殊階級。上海市的收入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都解入國庫（同上《華語快報》）。如果一切都維持現狀，他們今日幸而分得一所住宅，以後即終身失去自由。所以現下民主社會的自由經濟以私人財產權作主，仍不可少。

（未完待續）

內戰多出於雙方同有愛國熱忱卻宗旨不同

- - 致 ZXL 主席書（3）

黃仁宇

（續前）? 電視可能是傳達消息的障礙

我在電視上看到北京的學運也想到自己為青年時的天真淳朴。看到這成千成萬的年輕人，純真懇切而不走極端，也為中國高興。十多萬人的示威遊行沒有出事尤為難得。可是縱如是也免不了心頭的隱憂。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總不免帶著危險的成份在內，有如向鄰國出兵一樣可一而不可再。法國大革命時 1792 年八月十日和俄國革命時 1917 年七月十六日的流血慘劇同為以後局勢惡化的轉捩點。當日何人首先開火，至今責任未明。總之群眾的情緒易放難收。況且對你們講，年輕人不掀開反對的旗幟還不夠，中國要打破目前的環境所採取的任何政策還待他們積極的和熱烈的支持。說到這裡我們也不妨考慮到電視在目前事態間之功用：

美國的鄺凱特 Walter Cronkite 可稱為電視新聞之王。他曾說出電視新聞無非報紙雜誌之頭條標題。其內容一定要待其他新聞媒介賦予適當的縱深。我不但同意這樣的看法，而且更感覺得到一提及中國政治和社會上各種問題，解釋之中又要加解釋，自己的準備總是不夠。我寫的一本小冊子《萬曆十五年》就提到今日中國很多問題四百多年即已存在，其複雜可知。以這背景擺在電視的熒幕之上，你們的問題可也多了。在改革的過程中，現在科技固然賦予群眾立即傳達消息協定行動的工具，可是另一方面也製造的強大的壓力逼著共同的行動立即要滿足群眾之要求。如果這要求出自新聞的頭條標題，煽動情緒力量強，內容之縱深淺，則迅速傳達消息的媒介，反足為成事之累。因為幕後協商，詳細周密的考慮到對付之步驟，總不能趕上電波之速率。今日既不能封鎖新聞壟斷輿論，如何是好？只有幫助一般民眾增加在背景上瞭望各事之能力。容我班門弄斧的說來，也就是要多讀歷史。

XL 主席，你批評我們在東北時不接近民事，事誠有之，以下還要說及當日我們不能下放的理由。可是你們最大的毛病是硬化歷史。今日中國要開放輿論首先就要開放歷史。本來在哈爾濱已經提及，現在尚容我提出一段軼事。可見你我都仍可以不斷的增長見聞，而有時真理實可能出常情之外。

陳誠曾任台灣主席和副總統，以執行國民黨 1953 年“耕者有其田”法案具稱，一生剛毅嚴明，也是蔣介石有力之助手。最近他的文件才公諸于世。上面一段我曾說及在云南軍中看到走私販毒之事，我還以為是獨家新聞。不料從陳辭修將軍的遺稿看來，他在 1943 年在滇西任遠征軍司令長官時代就早在書札中寫出：“若幹部隊對於走私、運煙、聚賭、盜賣軍械等敗壞紀律行為，亦較其他駐地之部隊為多。”（《傳記文學》1989，1）。為什麼以他之高風亮節對這些事還只能開一隻眼閉一隻眼？而且他既無法禁斷，卻又將當中黑幕毫不掩飾的寫下，豈不貽笑千古？

?開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由來

XL 兄：我在國軍的時候坐飛機的機緣並不多，大部份時間也和你們一樣是憑兩條腿跑路的。在云南與四川兩省，走到的地方也不算少了。在鄉下看到的是什麼？“王氏宗祠”和“李氏宗祠”，大人物的“神道碑”，“舉人及第”和“文魁”的榮譽牌匾，“松柏維貞”的節婦牌坊。你們稱之為“封建”，其實乃是官僚制度的遺物。傳統政府自稱以詩書治天下，所抓住的“尊卑男女長幼”實為舊時代的“社會價值”，而不是“經濟因素”。在我們今日看來，不應當先責這種體制之貪枉無能，實際是設計過於簡陋，其掌握曾未深入淺出，財政與稅收尤為低薄。

但是為什麼一般文字都只說稅重民貧？實際民貧則有之，稅重則不確。當日無法

抽累進稅，所以稅率概以最貧寒的人戶為準則。例如下戶有田五畝，也和上戶有田五百畝同樣付稅，以致下戶叫苦連天。除了貪官枉法之外衙門的收入仍極低微，好在其行政範圍亦有限。只是富戶也無法因之存積資本。此時民法商法均未展開，借貸投資全無保障，商人常被勒捐，土地財富“逾制”即可能被皇帝“抄家”。況且宗法社會的力量雄厚，朱熹所說的“人子不蓄私財”，和一般官箴“清官不問家屋事”，更使個人財產無從固定。財富既不能集中，“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以上情形已經不少的學者寫成專書。較早的有潘光旦研究江浙地區的“望族”，作者發現明清之間，沒有一家延續興旺到兩百年以上。其他上下浮沉為時更短。最近十餘年來西方學者研究的專題論文更多，即我自己有關學術的研究，也以在這題目上發揮為主。

民國成立以來政治不能上軌道主要的困難由於財政問題不得解決。以後軍閥割據，也成了必然之趨勢。在茲新舊不接之際，只有私人軍事力量才能維持局面。可是這種力量籌餉的辦法已五花八門，有的及于攤派勒索，部隊間的連繫又以私人恩怨作主，也很難在三兩個省區間收效，而後面的財政問題也迄未解決。在這種情形之下才有五四運動及蔣介石之登場。

國民黨的政權純靠以江浙地區的關稅鹽稅商稅作基礎，蔣氏“黃埔嫡系”的軍事力量為核心才創建一個新體制之門面，其它則全靠蔣之牽扯拖拉，利誘威脅，精誠感召之不既，則繼之以陰謀策劃，總之事出倉卒以人身政治為總縮。很多責備他的人，指斥他之不守法。可是古今中外沒有一個革命者又能虔虔守法之成例。很多人都沒有想到抗戰期間動員三百萬到五百萬人的軍隊和強敵長期間作生死戰，不僅為中國歷史裡荒古未有，而且內地社會的情況距這種功業也有三五百年的距離。當然，這中間還有無數不如人意的地方。可是社會組織與時代的需要脫節，是誰的罪愆？難道這是當日我們志願從軍的人員及領導人物自出心裁所企劃下來的一種出路？

寫這封信的另一目的，則是說明我們亟應將 1945 至 1949 年的內戰合理化的處理。我脫離了國民黨已有了好幾十年，並且在 1974 年為美國公民。可是也還記著 1946 年上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的時候，被稱為陸軍智囊的校長哲魯 Leonard Gerow 中將曾和我們私下談起：大凡內戰之發生，出於雙方同有愛國之熱忱，只是宗旨方向不同。他就指出他祖父一代兄弟和從兄弟參加了南北戰爭中敵對之陣容。當日我還不十分同意他的說法，可是今日仔細想來，中國的四年內戰確實不由人身因素作主宰。如果只顧個人利害我和老兄也沒有槍桿子見面之理由。

最近四五年內我也在美國和台灣不斷的寫出國民黨在歷史上的任務，是藉著戰時狀態先造成一個新國家的高層機構。共產黨的工作則是翻轉改造內地的低層機構，所以你們大部隊以無線電聯繫，報紙出於油印，所有現代交通工具全部不要，

並且有意避免城市文化，因之才能專注鄉村的改革。所以縱是敵人，在歷史上仍有分工合作的功用。這些要點我已用中英文發表于專書報紙和期刊。我認為我之能夠公開如此倡儀即是中國革命業已成功的又一征象。

中國的內戰動員時比較殘酷，不能像美國人一樣將南北戰爭當作一段軍事競技看待，進而將其經過羅曼史化，可是另一方面要是仍墨守戰時的宣傳框格，只稱一方為道德之尤，他方為卑怯之極，則難能獲得讀者之信用。要是兩方都如此，只有引起年輕人覺得國民黨共產黨都不是好東西。中國要有希望，只有由下一代把兩方的劣跡，一併掃除，一切重來。殊不知這種態度，跡近虛無主義。最近有不少“罵歷史”的著作，已有如是之傾向。否定歷史，始自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今日仍有多數的歷史學家認為這是引導日後法國大革命走極端之始。又縱不如此，今日遮蔽往事，只有明日的失望。

我們無意作“戰爭販子”。可是幸與不幸，這戰事曾經發生，並且有遼沈戰役和淮海戰役作勝負之判斷。然則國軍與人民解放軍出自不同的政治哲學和不同的外交政策，還用不著說不同的領導方式。如果這種最基本的事實尚任之淹沒，即只能在歷史中留下一個大黑洞，也無法接觸到我一再提及的歷史上之長期合理性，即縱想客觀的提出中國共產黨之成就，也缺乏史實之根據。讓我再說一遍：歷史學之用途系于它之前後連貫，當中無間隙，才能把一切解釋得合理化。要是被宣傳蒙蔽，以至與電視所表現的都不相銜接，則也就是背離它的功用了。

(未完待續)

法制未備前要求自由如何是好？

- - 致 ZXL 主席書 (4)

黃仁宇

(續前) ? 中共之成就

中國的舊社會自有特長之處，只是與時代脫節，歷史已證明非經過大刀闊斧的改造，國家無法生存，否則何以被日本人殺進堂奧，不得友邦的援助還松不出一口氣來？當時這種事實已經各方看透，意見之不同，在於改造之程序與尺度。

關於中共的土地改革，迄今最真實的一段記錄為美國人韓丁 William Hinton 所記山西潞城張家莊的經過，他的書名《翻身》，此書能在美國出版，當日也曾費過一段週折，可是至今還在不少的大學裡選定為教科書，我聽說中譯本已在國內行銷數萬冊，可是我自己還未見過。

書中也沿用當日宣傳字句，泛稱“蔣匪”與“美帝”。可是其紀事部份，全部存真。中共首先遣入這村莊的無乃過去之流氓地痞，他們之工作在鼓動造反。一到情勢能確切的掌握才有另一批幹部組織村民，主持改革，當中不少為範文瀾所領導的北方大學師生，土地分了又分，作者解釋其最高的目的不在平等，而在將生產力（勞農）與生產工具（土地）合併，也就是厘平過去防礙生產的各種習慣制度，一切重來，以便進入合作性之大規模的生產。1947年華北四省土地改革的幹部在太行山中集會研究程序，到會的有一千七百人，討論了八十五天。怪不得當日村民埋怨，“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

在我看來《翻身》書中最動人的一節，在敘述到參與這運動的年輕人衷心矛盾細膩之處，一方面這群眾運動無異對舊社會開刀，不如此中國沒有前途，另一方面大刀闊斧之下也實在沒有各個人內在的公平。讀者可以就此了解革命之真意義。其間唯一之邏輯則是舊社會業已全部解散，既無尊卑男女長幼，也無根據成例之合理與合法，一切都在草創，整個村莊回復到理想的初民狀態，各人只有“生存權利”，所以即革命者自己的思想也待改造。這種種行動既曾被罵作欺世盜名，也曾被恭維為最前進與最徹底的改革。我們學歷史的人，只因為這種行動不可逆轉（今日縱解散人民公社仍不能恢復到1948年前的狀態裡去），也不能再來，才大膽的指出它在歷史上的長期的合理性。

即是中國共產黨本身也隨著土地改革而獲得新生。張莊的辦法先在這村莊裡成立一個貧農團，以貧農團為核心組織農民協會，又以農民協會為核心，組織村民大會。原在村莊裡面有共產黨員三十多個人，每個人都要經歷這三個組織依次審核才能保留黨員資格，這種程序稱為“過關”。不得過關的送到別處幹部學校去改造。所以今日中共有黨員四千六百萬，是全世界最龐大的政黨，也仍保留著這原始式由下至上的低層機構，兩種特點同為中國歷史中過去之所無。

中共自奪取政權之後曾在政策上造成嚴重的錯誤，也使中國人民受到空前的災害。可是短期間的損失不能和長期間的組織與結構相提並論。我也並不是以一個前國民黨下級軍官的身份，憑空吹噓歌頌你們的功德，只是說出中國近代史初看起來混亂糊塗，黑白顛倒。可是仔細追究起來大部份責任仍在讀歷史的人和寫歷史的人之身上。要是我們都放寬眼光，膽敢承認歷史之中粗線條的現實，讀之令人心悸的現實和人所不敢沾手的現實（實際上也是最後無可規避的事實），則接受革命邏輯之余仍可看出中國社會並未停滯後退，而是不斷的以梯次形態前進。

總之，一個以原始式農業生產為基礎的國家，向來法治觀念薄弱，倚靠社會價值作官僚政治之邏輯，一旦要仿倣現代國家，以新型商業的條理作組織之原則，有等於讓一隻走獸化為飛禽，不可能沒有改造期間的痛苦，也不得不曠日持久。

XL 兄，這也怪不得當初打倒旁人的人後來又要被旁人打倒。可是中國過去一百多年來已將政府名稱職務，軍隊組織原則，法律觀念，社會生活習慣及于婚姻社交，衣服飲食，甚至語言文字之一部份都從內向外翻了一個面，其改造之程度不能謂不深遠。我曾對美國學生說起，自羅馬帝國接受基督教以來，世界上沒有一個更龐大的改革，足與之比擬。況且現階段的工作，是造成上層機構與下層機構之間的法制性的聯繫，是全國能確實在數目字上管理。這與我們當日在暗中摸索的情形相較已算是坦途了。

?接班人的困難

話雖如此，你們未來的領導人首先必遇到一段極為艱險的局面。如果經濟瓶頸在於能源與交通，則縱算局面良好也須要兩三年才能疏通。貨幣之貶值在經濟改革時也極難避免。(我曾在 1987 年十二月六日在哈佛大學舉行的九州學會年會指出今後十年中國極難避免通貨膨脹。)年輕人又在法制未備前要求自由，如何是好？

是否我自己年齡太老，思想硬化，不能佔測到年輕人的情緒，才會杞人憂天的多顧慮？

可是即算如此，幾件最基本的事實擺在眼前，無可推託：

民主與自由都是抽象的觀念（況且英文裡 freedom 和 liberty，同譯為自由，用法與含義即不盡相同），前已言之。實際實施時都要透過每一個國家的歷史和地理之背景，才有確切的意義。以美國而論，南北戰爭即是重新解釋這些名辭之一大分水嶺。並且又在兩百年來經過聯邦和各州無數立法的程序，今日也仍由最高法院不斷的覆核，才將社會上分工合作的權力與義務分划得符合刻下經濟展開之程度。中國以一個新社會加諸舊國家之上，在時間與地點上都和美國處境不同，其實這種差別很多人早已體會到，大多數的美國人倒沒有顧及其間的鴻溝。

前些日子，《光明日報》的記者戴晴就說起遊行示威的學生對外國和港澳、台灣的記者慇懃解說，對內地的記者倒不理不睬，這當中也有一段須要解釋。外國的新聞從業員報導中國的學運只因為這是一件新聞，在西方社會裡新聞乃是一種商品，所以將中國學生擺上鏡頭，並不即是支持游街罷課。而且即算有些新聞從業員個人同情于中國的民主人士，他們的態度也靠文化市場的行情為轉移，一般極難持久。方勵之教授的照片已見于《大西洋雜誌》及《紐約時報週刊》的封面。但是蔣介石，毛澤東和鄧小平的肖像也都曾在《時代週刊》的封面上出過鋒頭。這雜誌也曾先後對各人作過高度的恭維和低度的奚落。同樣的，美國的總統無一

不曾被新聞記者批評指責，尤其是漫畫家挑剔譏諷之對象。總之國外的新聞媒介體只能傳達消息，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你們一旁的年輕人過於重視他們的神秘力量，只引起你們領導人的反感。他自己為年輕人時即是冒險家激進分子，又曾備經鋒鏑，數遭憂患，所以曾說“天塌下來也不害怕”。他本來有“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獨立精神。最近哥倫比亞大學一位政治系的教授作文稱，他本來打算退休，可是接受學運之挑戰，他倒可能改變計劃。雖系猜測之辭，我們不能否定這樣的可能性不存在。

只是兩方都如此的打太極拳，也不是辦法，外國新聞媒介體不足懼，國外的輿論則極為可畏，這也就是說，如果中國人能解決自身問題，用不著顧及外間的批評；如果不能解決內部的問題，壞影響之所及，已不待新聞從業員之報導，並且刻下一般之要求為自由與民主。其展望只能在今後經濟繼續擴充時兌現。這也就是說，只有更高度的分工合作，利用科技的範圍擴大，各人職業上的選擇性增多，社會上的流動性增強，才能產生多數人行動之自由。同時逐漸放寬紀律上之約束，言論與報導的自由，才更為實際。如果前路壅塞，只有引起後途的解體。今日真茹之七十五萬人可以算作特殊階級，明日也會要求他們的自由。

（未完待續）

為解決危機提出幾條建議

- - 致 ZXL 主席書（5）

黃仁宇

（續前）渺小的建議

為了使這次不流血的革命獲得成果，我有以下的建議：

第一，XL 主席仁兄，中國共產黨可以改稱中國人民黨，上次我和你在紐約說及，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主義者宣言》裡面指出共產主義者不應另外組黨，與勞工之政黨對立。俄國之社會民主黨的布爾塞維克一派系改稱共產黨，行于 1918 年三月之遷都莫斯科，由列寧主持，當時仍有藉此造成世界革命之宏望。中共成立不久，以少數黨希望奪取政權，只能採取列寧的路線，以優秀份子作為職業性的革命家，以陰謀發難。“民主集中”即和中國傳統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相去未遠。總之這方針已與今日中共之領導全國，從事建設發生了很大的距離。

現在即在天安門集會的學生，也從未提議推翻中共，中國的國際地位又空前的優勢。凡是過去必須要高度保密的地方有如可能牽涉國際戰爭，內地社會內不可告

人之處，革命過程中之缺乏內在的及各個人之公平（即毛澤東亦稱“矯枉過正”）與存積資本時之不顧私人財產權利（包括農人工人之勞動力）都已是過去事，並且有如這封信裡說及，早已寫成白紙黑字，流傳中外。經過這些手段所打開的局面，主旨在保證中國之生存，卻又不可逆轉，則你們已無須如過去一樣的隱秘，也不如趁著這千載一時的機會作大過於馬克思強過於列寧的變更。中國國民黨曾命名改名五次。我就想不出你們一定要保持一種狹義，雖帶神秘性卻又尷尬，而令人疑惑之名目的理由了。

你們 1958 年十二月十日黨中央的決議也明明說起共產社會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只是人類最高的理想，既如此則不可能猝爾施行，尤其不可能強迫的付諸實施。倘使你們採取那樣的態度，則世界上很少的人還有理由和你們作對，海外華裔人士已有四千萬，很多對祖國懷有真情實誼，只因為你們一定要保持過了時的名目，使他們望而卻步。既如此為什麼還不能放棄這樣一個頭銜，減輕中外的疑懼？而且使以後得到更廣泛的支持？在我看來這樣一個徹底的改革不失為突破難關的一種途徑。

你也可以說：“難道孔子所說的正名有那麼大的功效？現在年輕人要的是民主與自由，如果他們的要求不能兌現，只改共產黨為人民黨，不是要的是麵包，給的為石塊？”我的答復則是因為你們自己重虛名而不顧實際，所以學生們也用抽象的字語和你們鬥爭。假使你們爭取主動放棄那種龐大籠統的名目，豁除那種凡事經你們動手都有道德價值，都帶絕對性，都無可商量斟酌之余地的氣氛，應當立刻增強互信。因此兩方也可能發現彼此之間距離並沒有理想之大，很多齟齬實際不外一個技術問題。

第二，你們的標語口號可以代之以實事求是的歷史。我敢於說今日天安門的事件，半由你們自己歷來的宣傳政策所造成。“中國人民好，政府不好”，“學生游街抗議，政府就失掉了天命 mandate of heaven。”你們如此說，外國人也如此照抄，已先造成一種定型 stereotype。我在美國教中國歷史的經驗，那是很多年輕學生接受瞭如此過於單簡的觀念先入為主，以後極難接受歷史的曲折與縱深。

你們過去的口號例如“鼓足幹勁，力爭上游”都是帶有集體性質的，適于集存國家資本時之情緒。並且大家都穿藍布的中山裝，“無產階級專政”在一般人心中，才名副其實。自從 1979 年以來，這些標語不僅失去效用，而且使一般人對你們的誠意發生懷疑，現在這些標語口號雖然斂跡，可是“堅持”的一個大帽子，卻始終沒有放棄。我在哈爾濱開會時就觀察到，一般年輕人研究歷史生動活潑，只有年老的一派（好在我自己也屬老年人）拘泥著過去之意識形態，轉不過來。所以前些《人民日報海外版》（1987 年二月十六日喬還田）就提出“史學危機”，已不待我提出。

歷史不僅是鏡鑒，而且是今日行動之出發點，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公眾能接受之歷史，等於讓億萬人之行動出諸暗中摸索。我們沒有心腸去責備年輕人。他們的苦痛多，負擔也重，良心觸發，情不由衷。可是從電視上看著有些學生對外國記者的訪問，當中也確有矛盾之處。例如旗幟上寫的是“自由”，嘴內提出的則為“平等”。最低限度對目前經濟政策講，兩者實有絕大的差別。如要貫徹自由，則需鼓勵私人資本之發展，因之很多文教事業之工作職位可能由市場的需要而產生，自此脫離官僚之獨斷分派。如為平等，則應當放棄經濟改革，恢復到過去均一雷同之形貌。這種矛盾甚可能始自你們高層人物意見之分歧，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沒有將歷史翻新，一派人以過去之口號標語為南針；一派人不斷的試驗，希望打開出路，號稱“實用主義”pragmatism，也缺乏理論上之根據，因之上下之間更沒有“對話”。

我已承你們多次邀請參加歷史學的會議，可是我自己也是一個“自由學者”(即是不屬於任何單位，德國人稱 Privat Gelehrte)，來往不易。既曾在老兄面前亂扯過一頓，現在索性把我在歷史學上大範圍的看法作一個簡短的綜合。

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或甚至社會主義對立的一個觀念，在二十世紀的末年，業已過時。東西冷戰的局面鬆弛之後，這對立的趨向將更為薄弱。原因是世界上的交通通信進步，國際間的接觸頻繁，國民間彼此之了解，有了很大的增進。加以原核戰事的威脅，使各大國更感到不能堅持過去狹義的意識形態，而必須接受和衷共濟的方案。這種要求強迫著歷史家尋覓新的線索，在過去紀錄之中找出證據去支持並強調今日共存共榮的局面，也就是把刻下的立足點通過歷史解釋得合理化。

從這種角度看來所有國家之現代化，都有一個從過去農業國家進展到新型商業國家之形勢。在技術的條件上講，須構成資金廣泛的流通，經理人才不分畛域的僱傭，和技術上之支持因素有如交通通訊保險等通盤支配，這三個條件全靠信用，所以私人財產的權利必須固定，而且有合理的法制支持。然後所有權 ownership 和僱傭 employment 結合構成一個大羅網，農業與工商業交流，而且越做越大，也就是說這樣的體制已能使所在的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

我所研究的十餘個現代國家無一能脫離這樣的疇范。有些國家如荷蘭及美國在開創時即大體上採用了上述路線，以後逐步的增強。有些國家如英國和法國過去的傳統勢力雄厚，須要經過長時間的動亂，一直要等到上述三個條件組織就緒，才能重見和平。所謂資本主義者應指初期如是組織的國家全部以私人資本為主宰，所以資本家的政治經濟地位也佔特殊的比重。初期的積累資本通常不擇手段，如利用童工女工販毒販賣人口開拓殖民地，禁止組織工會等。現今沒有一個國家尚

能始終貫徹這樣的作風。

所謂社會主義者始自十九世紀初葉，也不外將公眾的資本，加諸于私人資本之上，並且在立法上限制私人資本的過度發展，同時尚添設社會福利。前述三個組織的基本條件和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原則則始終沒有更變。迄今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完全避免這樣的調節。美國可算作資本主義最前端的國家，可是在取締托辣斯，培植社會福利各方面也並不是全然排斥社會主義的精神。中國與蘇聯過去不要私人資本，只有國家資本和集體資本，現在看來仍只是不顧人身權利高速存積資本的一種戰時體制，一到恢復正常狀態，仍要將私人資本滲入，其程度以使人民有最多的機會找到工作，使這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在國際市場佔最大的優勢為主旨，無以名之。我提議稱為“社會資本主義”socialist capitalism。不僅中國已走上這道路，像蘇聯和其他的國家都要步此後塵。也只有在這種主旨之下台灣與大陸的統一，公算才高。

我用這種觀點回頭看中國歷史，發現到不僅可以將五四運動以來的事跡解釋得前後一致，也可以將一千年以來的歷史解釋得前後連貫。例如說我已提出王安石不只一次。他的方案即是將財政片面的商業化，只是私人財產權沒有保障，沒有銀行法院在後面作技術上的支持，他的商業體制與農村經濟脫節，形成一個不能在數字上管理的結局。即各朝代企圖在財政與稅收求改革的人士，造成一種雙重價格體制，也無一不歸于失敗。因為兩種體制互相競爭，有效率的一方面必在短時間內佔優勢，可是也在官僚機構中產生了分化作用。官僚既能上下其手，貪污也無法禁止。當時的技術問題，終釀成一個道德問題。有如唐朝的韋堅、楊慎矜、劉晏，宋朝的王安石、蔡京，元朝的阿哈馬、盧世榮、桑哥，和明朝的張居正。他們自己身敗名裂，他們所在的朝代也隨著崩潰。

所以我把過去七十年的事跡帶積極性的寫在這封信上，要使大家知道這問題之嚴重與龐大，刻下的雙重體制有它歷史上產生的原因。如何把這問題解決，不僅是救目前之急，也替過去一千多年的問題尋找到突破的方式。如此看來你們的領導人不應當為天安門絕食的青年而皺眉，而應當歡迎這種捨己為公願意做烈士的精神和幾十萬人遊行示威不破壞搗亂的紀律（這些地方是社會主義的教育成功之處）。中國要突破今後的難關，還要借重于這些群眾之力量。

要是這難關不能突破，那麼只有歷史的倒退重演。我不願作此消極語，但是任何有明智的讀者，也不難體會到可能的結局了。

第三，迅速成立一個青年到各地工作的集團，讓他們參加經濟立法的工作。我所建議的不是“紀檢”，而是經濟立法。

今日中國的問題不僅是紀律敗壞，而是沒有法律。並且補救的辦法也不能僅在北京作主，倘如是也仍只是重犯官僚機構真理由上至下的舊套。而實際應該在各處設立十個或一打以上似評議會的組織，也像經濟法庭。各種案件由紀檢人員或地方行政人員提出，這評議會或法庭決定何種情形為合理，何種情形為不合理。合理之後行之有效，才認為合法，這種程序實際也是以司法機構立法。英國在光榮革命前後之二十年，就利用這程序創造了不少有關商業的法律。其好處則是針對實情，不妨制主動，不先作氾濫的爭辯。由此創造的事例可以推行到一個地區，如果有妨礙中央或鄰省的地方也仍可以由這種組織中的高級機構複決。這種辦法也有美國之先例。

我不主張讓年輕人做法官，而是希望他們能為陪審員或助理評議，也不主張發薪水，而只是依賴他們代表民意，參與經濟立法。他們志願工作，也可以代替大學校裡三年級至四年級的一部學業。

我知道表面看來，建議的程序看來很荒唐，尤與中國愛形式的傳統不合，可是現今最重要的工作乃是放棄形式，追求實際。同時“貪污”兩個字，仍是道德的評價，不是法律上的罪名。中國要鼓勵私人資本之展開，必須決定何種行動為違法，例如侵吞公款，濫用職權濟私，行賄受賄，偽造文件。光是雷厲風行還是不夠，因為這是造成長期體制之手段，也要能使各級幹部安心工作。以情形之特殊，沒有一個人可能稱為此中專家。青年人志願在當中工作一段時期，可以對國家有無窮的貢獻，同時他們自己也可以獲得極有價值的經驗。

第四，開放輿論，我想這已因學運而成為事實。如果以上的建議能付之實施更不再成為問題。只是要注意，道德必與法律分途，國防機密仍不能放棄，有權力必有義務，中國和外國的習慣不盡相同也要考慮。最好由新聞從業員和作家作技術上的準備。聘請外國顧問，也是一種辦法。

XL 主席老兄：你我都有一種長處為年輕人所無。活得久了，就知道批評容易，被批評難堪。可是這次學運要能使持槍桿子的人不再左右政治，國家大事意見之不同，都能公開討論則批評的人和被批評的人都可以心安理得。四十年前在四平街的前線既然逃過仁兄的槍桿子，寫這封信也算盡了東西兩半球萍水相逢的緣份。即此收筆，海天在望，書未盡意，恭頌健康！

R (Ray Huang, 黃仁宇) (1989年)五月十九日于紐約州